我的行医生涯

冯仲泉　口述　冯贵明、刘光泉整理

我祖父冯仕酉（1840年—1917年），出生于新繁县崇义乡郑沙桥一个农兼商（开粮油米店）的家庭。祖父自幼好读诗书古籍，壮年投师学习中医，勤学苦奋，行医数十年，得名“冯小儿”。1917年病逝崇义桥，终年77岁。

我父亲名久安，字登长，（1876年—1945年）。祖父逝世后，迁至今金牛区天回乡白塔村。父亲自幼继承父业，亦医，亦农，以医为主。他医术精湛，具有良好的医德医风，在崇义桥，斑竹园，三河场，天回镇方园数十里范围内，颇有名气。

父亲好交医友，新都县的杨礼先（内科）、相国治（内、外科）、王仲孚（儿科）、冯谓之（内科）；新繁县的薛八老师（内、外科）、黄书田（内科）；成都县的沈玉禅（内科）、陈责孚（针灸科）、谢栓容（儿科）等。都与父亲经常往来，相互切磋，取长补短，冯氏儿科的发展，得益不小。父亲在几十年的实践中，总结了不少行之有效、疗效较好的秘方，传于后代。如疏风清热，化痰止咳的“太极丸”、

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.ertongbook.com

清热下结，荡涤腑实的“小红丸”、清热熄风，芳香开窍的“四象丹”、镇惊安神，强心定志的“辰珀散”、诸疝腹痛，行气止痛的“桔核散”、清热散结，并治疗小儿口疮，单双乳蛾的“吹口丹”、芳香开窍，止痉，温中散寒，止痛的麝艾等验方。尤对儿科的（麻疹）、（牛痘、水痘）、（急惊风、慢惊风）、（疳积）疗效尤佳。

民国26年（1937年），患儿曾××，男，3岁。父亲曾介眉，住新都县城关，开酒庄铺。患儿高烧反复不退十余天，惊风后喉中痰鸣如拉锯声，服多药未效，求治于父。我父用家传“太极丸”、“四象丹”并配合汤剂治疗，病愈后，病家为表示感激，常用大曲酒酬谢。又如民国15年（1926年），熊××，男，4岁。家住矮垂店（现天回乡莫龙村七组），患疳积，双目已看不见东西。家父用“四叶鸡肝散”治愈。熊××活了57岁，于1980年去世。

我生于1920年，住天回乡西塔村。读过几年私塾。1937年开始随父亲学习中医。先后精读过《伤寒论》、《本草纲目》、《医宗金鉴——伤寒，金匮，儿科，妇科篇》、《温病条辨》、《温热经纬》、《内经》、《难经》、《医学五则》、《医方捷径》、《串雅内，外篇》、《雷公炮炙药性赋》、《幼科要略》、《幼幼集成》、《汤头歌括》、《医家四要》、《濒湖脉学》……等名医古籍。1941年，在本市长顺街和陈玉林（外科，针灸）开诊所，诊治内儿科疾病。抗日战争中，日本飞机轰炸成都，人心恐惶，社会紊乱，乃回家继续随父亲诊病。1946年6月，父亲积劳成疾逝

世。

父亲逝世后，由于我当时年青，资历浅，在崇义桥，斑竹园开业，几个场期，未能诊得一病。病人和群众的心目中，知道有老“冯小儿”，还有个少“冯小儿”，但老“冯小儿”已经不在世了，年青的“冯小儿”医疗技术究竟如何？病家信疑参半，想试探一下我的手艺。1946年夏初，崇义桥名医刘庆波之侄儿在成都读书，身患重病，医治无效，回家求治。证见：反复发烧，神昏谵语，大便数日不解，舌质红绛，苔黄腻，脉洪数。病家请了当地几个较有名气的中医，我也被请去。刘庆波要求医生各自先谈辩证立法、选方司药的道理，然后评议选方。结果我的以通腑泻热，荡涤实热的药方被选中。病人服药后，第二天热退身凉，续服数剂痊愈。刘庆波乃一方名医，其侄之病不能治，而我却一诊即中，数剂而愈，名声顿时传开。同年秋天，在斑竹园诊治一个较有社会地位的病人，病家把医生请到家里住下治病，若病不见好转，医生不能走。病人约50多岁，体胖，赶场回家时突然昏倒，不省人事，牙关紧闭，四肢颤动，随即口吐涎沫，喉中痰鸣有如拉锯，脉滑数，诊断为“痰热中风”。急予家传“四象丹”开窍熄风，再以清热化痰“太极丸”，配合疏风涤痰通络的汤剂，艾灸人中，百会，风池，合谷，足三里等穴位。一诊后，见病情好转，人已清醒，口能张开，余证尤存，复诊十余次，基本痊愈。病家为我挂红送匾。

医道之术，博大精深，学无止境。为了提高自己的学术水平，我经常汇集医界朋友，以学他人之长。如：崇义桥的

刘庆波，相伯昭（现为成都市名老中医），彭步云，陈万松（现为成都市名老中医），班竹园的薛登坤父子，三河场的杨文早，白水寺的吴世安等。

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，我除搞好本职工作外，还协助人民政府清匪反霸，巩固新生的红色政权。1951年地区规划后，加入成都市卫生工作者协会。一般都在天回镇诊病，并积极参加防病灭害工作。1952年响应政府号召，发展人民医药卫生事业，在一无资金，二无人，三缺办公用具的困难条件下，我和几个同道集资约一百万元（相当于现在的人民币一百元），成立了天回镇联合诊所，由我兼任所长。由于经费不足，发工资困难（每人每月20元），我们发扬了艰苦创业，勤俭办院的精神。在我的带动下，医生到附近的场镇赶场诊病。所收经费，回院全部上交，星期天也不休息，参加医院各种建设性的劳动……等，使医院不断发展。

为适应新中国的卫生事业的发展和人民健康事业的需要，1955年3月，我报考四川省成都中医进修学校，进修学习一年，聆听了著名中医专家如：蒲辅周、王伯岳、王文鼎、李斯炽、杜子明、李重人、邓绍先、何伯勳、黄国章、凌一揆、余仲权等的讲课，在理论上有了更进一步的提高。结业时欢送了李重人，蒲辅周，王伯岳，王文鼎四老师上北京工作。1958年，我参加了成都市卫生界代表团，上北京参观学习，受到了部分中央首长的接见。

随着医疗卫生事业的蓬勃发展，1958年，医院的资金，技术人员都有了一定的发展和规模，诊所改为天回地区联合

医院，我被选为院长。1960年，我调郊区中医研究所任职，当时主要研究本区各位老中医的医绩，整理他们的中医单方，验方，三年自然灾害，国家困难经费不足，研究所于1962年上年撤消，本人赓即要求回天回地区工作（此时医院改为天回公社卫生院），继续选任院长，并坚持在门诊看病。1963年初，经区卫生科批准，开始带长子冯贵明学习中医。那时由于三年自然灾害，水肿病，黄肿病，单腹胀，疳积病，虚痨病，麻疹都较多。对以上病证，都有一定的研究治疗。“四清”后落选。无官一身轻，父子之间，集中精力，研讨医理，整理临床医绩。1980年上年调成都市干部疗养院中医科负责，诊病兼带实习徒弟3人。1981年底，由于年老多病等各种原因，申请退休，留于天回卫生院（现为成都市金牛区中医医院）。

我行医四十多年，在继承家传儿科的基础上，通过进修学习，临床实践验证，以及各名家的指点，更丰富了冯氏儿科的内容。我对家传秘方作了进一步的研究，临床效果研究如：太极丸有疏风清热，化痰止咳，临床上对小儿的风寒，风热咳嗽，咳嗽痰多，喉中痰鸣，喘咳有著效，对老年人的慢极咳嗽也有显著疗效。小红丸清热下积，荡涤胃肠实热，对食积，痰积，热积，虫积等有形的积证有著效。桔核散对小儿的各种气滞腹痛，伤风腹痛，诸疝腹痛有著效，并对成人的肝郁气滞的疼痛，胃脘痛，肠鸣腹痛有显著止痛效果。对辰珀散，四象丹，吹口丹，四叶鸡肝散……等，经几十年的临床验证，效果比较满意。疾痛的产生，发展，随着社

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.ertongbook.com

会，环境，卫生，文化的变化而变化。比如：解放前社会文化经济落后，卫生条件差，各种传染病较多；三年自然灾害，人民生活困难，营养不足，肿病，疳积病较多；近年来生活条件好，独生子女多，多衣精食，偏嗜又成为小儿疾病衍变的重要原因。例如：1964年春节麻疹流行，由于天回地区方圆二十里地处农村、文化落后，缺乏卫生科学知识，很多病家不把患者送医院治疗，对患儿的护理常因不按科学方法而致病情加重或死亡。有的在家用柏树叶薰，反将患儿关闭屋内，这种不科学的方法，使很多麻疹患儿死掉。在这种情况下，我常和其他医生送医送药，上门服务，向病家反复宣传麻疹的防、治、护知识，减少和避免了麻疹患儿因防治护理不当引起的病情加重或死亡。

医生对病人应有恻隐同情、无限关怀之心，不可因病重而弃之。1984年秋，简阳县一位五十多岁的病人，患肝脾肿大，引起腹水。患者经几家大医院检查治疗，效果不佳。病人慕名专程求治，旁人说“大医院都治不了的，你何必搭手，若治不好有损名声，多一事不如少一事”。我当时认为“只有未识之症，没有不治之症，如果都不治，岂不是要病人等死”。对病人我首先认真询问，仔细辩证并鼓励他建立病能治好的信心。经过两个多月的细心诊治，治好了患者。在门诊治病中，对于重病不愿住院者，过二、三天后要去拜访一次，关心病人服药情况和证状的转归，从中吸取经验，加以总结。

我自悬壶行医以来，数十年如一日。“四清”前，长时

间没有星期天，节假日。除诊病外，带领职工勤俭办院，参加各种劳动，预防接种，搞好血防等工作。不论寒暑昼夜，病人随到随诊（不管在家里或在医院），不摆架子，不训病人。每年诊治病人近两万人次，从来不挣外水，对于病家的酬谢，都是婉言谢绝。对经济确有困难的，常解囊相助。记得解放前本地一贫苦户陈××患霍乱，呕吐，泄泻两天，看着病人快要死去了，家里又无钱医治，病家万分着急，我知到即刻送医送药，挽救了病人。我还常以家传秘制丸散，赠给经济困难的患者，使他们得以康复。

医术是为病人服务的，我从来不把祖传秘方视为私有，总是毫无保留地带徒传医。七十年代以前，在我的指导下，把家传秘方献给了医院，亲自动手制成成品，并把用法，服法告诉医院同道，使大家都可以应用。从1969年秋开始，合作医疗如雨后春笋般涌出，我为培训赤足医生，积极编写教材，讲授中医基础课程。赤足医生轮流前来见习中医门诊，热心指导。现在他们都可以独挡一面地工作了。我的儿子冯贵明，1963年开始随我学习中医，多年来由于党和政府的关怀，勤学苦练，刻苦钻研，基本上掌握了冯氏儿科的精髓，有一定的理论和实践经验。1980年4月，被国家录取为全民中医师。小女冯贵兰，1981年随我学习中医，现已基本上能处理儿科常见病多发病。

现在我已是快要七十多岁的人了，虽然年老多病，体弱，一想到那么多病儿需要我治疗，就不顾自己，坚持上班。如：有一次发高烧后，咳嗽剧烈，胸透为肺炎，自己已

经天旋地转，身不由己，不能支持。医院领导和同志对我很关心，都劝我休息。我看到病人的疾苦，是好象自己的疾苦一样，第二天仍照常上班诊病。近几年社会活动，会议较多，有时一开就是几天，回院后第二天照常诊病。

几十年来，我在为人民防病治病中，做了一些工作，学术上经验有一些。成就不大，贡献不大，但党和人民却给了我很高的荣誉。多次被评为市、区、乡、院的先进工作者，区、乡人民代表，中华医学会成都中医分会理事，市政协第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届委员，金牛区政协常委，1985年被授于成都市名老中医的光荣称号……等。

现在，我虽已至晚年，为了振兴中医事业，继承和发展祖国的医学遗产，为人民的健康，为四个现代化的早日实现，我要抓紧时间，将我的点滴经验整理成文，贡献给人民的卫生事业。

1987年10月

田 八 味

汪 洪 定

六十年代初，我区老一辈的中医师大多健在。他们分布于我区城乡各医疗单位中，或带徒行医，或潜心著述，为继承祖国医学遗产，起了一定的作用。

田八味，就是当时我区较有影响的一位老中医。他本名田鹤鸣，四川简阳人，因他开的药方一般不超过八味，所以群众赠给他“田八味”这个雅号。

田八味生于公元1883年，1980年病逝，享年97岁。他15岁上成都，初学银匠，30岁跟随叔父改学中医。学成后，在青羊宫仙寿药号坐堂行医。解放前，生活较为清贫。解放后，家住苏坡乡金沙五队，仍以行医为业，每天早出晚归，病人每请必至。但更多的时间是在青羊宫庆丰茶园，边喝茶边诊病。1965年初，田老脚部被车碾伤，在家养病，不少患者遂登门求医。由于病人传名，看病的人愈来愈多，由学徒替写处方。学徒用毛笔正楷竖书，写得一手好字。加之药的味数少，一付药一般不过一两角钱，经济便宜，又能治疗疾病，患者满意；药剂员检药方便省时，也极愿检这种单子。

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.ertongbook.com

由于以上原因，田八味的名气随着他的处方笺飞遍蓉城城乡各地，愈来愈红。在这种情况下，他只得和大队干部联系，在该队窑场坝设立诊病地点，由大队统一收挂号费，满足了更多的患者看病。

1965年11月，金牛区卫生局为发展中医，满足群众需要，特聘请田老到区医院看门诊。杨家全局长问他要多少钱一个月？他答道："只要求每月六十元、够一家三口人生活费就行了。"田老行医一生，不为名不为利的精神令人钦佩。田老到区医院后，月薪定为86元。

田八味用药味数少，而又能治疗疾病，这里有什么诀窍？看他的处方，行家都知道；他学的是张仲景的《伤寒论》和《金匮》，处方的特点是用药少而精。例如：感冒患者用麻黄汤或桂枝汤；咳嗽患者用小青龙汤或麻杏石甘汤；心肾不交患者用桂枝甘草龙骨牡蛎汤，等等。以上处方都不过七八味药而已。但用这种处方，要求看准症候，增减一味药都必须丝丝入扣，方能奏效。如用药不当，可能给患者增加痛苦。因此，用这种处方难度较大。田老一生知难而进，锲而不舍，这种精神值得学习。

田八味的好景不长。他到区医院上班半年以后，史无前例的文化革命开始了。由于他是老中医，颇有名望，平常爱穿长袍，见人点头哈腰。这些都构成了革命的对象。起初，只被大字报轰了一轰。到1969年清理阶级队伍时，由于他有一个儿子在台湾（至今下落不明），被列为特嫌。造反派硬说他有一个皮包，里面藏着特务名单。于是，一场深挖细查

特务皮包的活动全面展开。田八味这位曾红极一时的名医，终于被打成反革命特务，到了“黑”得吓人的地步。田八味在受难的时候，暗地对亲属说：“我决不能死，我死了给你们留下罪名永远洗不清啊。”所幸的是，他以年老伤残之躯，经受种种磨难，而终于拖到了“四人帮”覆没，自己恢复名誉的一天。

（本文承蒙田老的孙女田玉霞医生提供情况，特此鸣谢。）

1987年7月11日

廖士祥先生生平事略

周开培

先生名士祥，字仲和。1895年（前清光绪21年，岁次乙未）7月11日出生于成都县青苏乡董家大田。1964年阴历正月初三，因患高血压脑溢血症，医治无效，卒於成都市第三人民医院，享年70岁。在追悼会中，各方亲友、省统战部、省政协领导和成员，均来吊唁。骨灰安厝於原出生地成都市金牛区青苏乡董家大田旧居墓地。

先生在诸兄弟姊妹中，聪颖敏捷，勤奋好读。十岁时，就读於成都县立小学堂（校址在成都市青龙街），以成绩优异，毕业后升入成都县中学堂第五班肄业（该校即现在成都市第七中学的前身，当时校址仍在成都市青龙街）。在成都市中学堂毕业后，考入四川省法政专门学校攻读。校长系熊晓岩先生。当时该校共办有两种班，即官班和绅班。官班类似干部调训班，绅班为学生直接考入的班。先生在校时，以成绩优异见重於教师和同学，惟以家境困难，食宿各费，难以支付，几至辍学。幸得校长熊晓岩先生和亲友赞助，始得于1917年完成学业。

1917年在法政学校毕业后，应同乡熊子骏先生之邀，赴重庆担任蜀新报编辑。陈毅和熊子骏先生担任主笔。新蜀报是当时重庆的进步报刊，系熊子骏、周钦岳、肖华菁等进步人士所合办。当时，朱德、刘伯承等均在重庆，先生与之过从甚密，曾和朱、陈、刘、熊等人合拍一照。这张照片，我曾见过，可惜在成都解放前夕（当时正是胡宗南部队盘据成都市的白色恐怖时期），家中人深恐胡宗南部队搜出，为了避祸，将此珍重照片毁去，深为可惜。

新蜀报系进步报刊，深为反动政府所忌，后被查封改组。先生、熊子骏先生和陈毅等脱离新蜀报。后经熊子骏先生介绍，先生乃到熊克武（当时四川督军）将军司令部担任秘书。1924年，熊克武将军奉孙中山大元帅令，改所部番号为建国川军及川、滇、黔联军，率部驻防湖南、贵州一带地区，1925年6月，取道贵州、广西边境，开赴广东。延至同年8月，全军达到广东境内，驻扎连山。先生亦同时随军前往。后因蒋介石背信弃义，将川军全部缴械，将熊克武将军囚禁虎门，三年之后才释放（详情清阅成都文史资料第4辑40页——54页）。廖世祥先生在乱军中改装支身逃回四川。

先生由广东回四川后，1926年，应川军第29军王铭章师长之邀，担任该师秘书长职务。该师驻防川北广元、什邡、德阳、潼川等地。1927年到1936年，由师部外调，先后担任什邡县长、广元县长、潼川县长和潼川驻区事务部主任以及合川县长等职务。

1937年抗战兴起，王铭章师长奉命率部出川抗日，先生

奉命留守成都，办理联络和后勤事宜。

1940年，应四川省政府秘书长李伯申之约，到省秘书处任机要秘书。1942年，兼省秘书处所属视察室主任。1940年——1949年，担任成都县县银行董事长。解放后，应刘伯承和熊克武将军（当时系西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）函邀，到重庆，在西南军政委员会任秘书。全国各大行政区撤销后，随同熊克武将军调北京，在全国人大常委会担任秘书。1960年调四川成都省统战部工作，一直到1964年逝世。

先生为人正直，对桑梓人民，从未仗势欺压。在成都县多年，从未受过任何贿赂。常给桑梓人士排难解纷，扶危济困，因而得到县人敬爱尊重。

先生虽是国民党政府官员，但不是国民党员，系无党派人士。1951年在重庆经熊克武、但懋辛两将军介绍，加入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，成为民革正式党员。

先生一生思想进步、同情革命。在重庆时，深受刘伯承、陈毅的感染。在成都时，经常与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往还。如熊子骏、李晓亭、韩伯成、熊克成、但懋辛、牛范九、熊哲帆等。曾掩护、支援、营救过不少进步人士和共产党员。如1927年重庆三·三一惨案，共产党地下党员熊子骏被逮捕，经党内设法营救脱险，逃回成都后，隐藏在先生成都市半节巷寓所两年之久。以后警方查觉，又改迁隐匿于成都县青苏乡董家大田先生旧居二年余。后因敌特跟踪追索，先生又将熊子骏迁至川军王铭章师部隐避，并推荐熊任师部秘书，后又代理潼川驻区事务部主任。为了永久安全

计，先生商同孙德操将军、王铭章师长同意，送熊子骏出国，留学日本，孙、王二人和先生合助留学费用大洋4000元。

又熊克武、但懋辛两将军被蒋介石将部队缴械后，回川住成都，经济方面颇有困难，先生常予接济，接济费每次300元至700元不等，均经我手送去。

成都解放前夕，廖士祥先生又掩护熊克武将军之弟熊哲帆，送到成都县洞子口（今成都市金牛区洞子口乡）乡下躲藏。

同乡人进步学生雷启芳被囚禁于蒋介石的成都行辕，先生四处奔走，托四川省政府秘书长兼成都行辕第二厅厅长孟广澎说情，释放了雷启芳。

1949年成都解放后，各县发生土匪暴乱。先生先后说服成都县太平乡乡长曾次金和仁义乡乡长刘熙黎，将所有的枪枝弹药缴交人民政府，争取立功赎罪。当时曾次金和刘熙黎各拥有各式枪枝数百支，其它乡镇只有极少数枪支，不足为患，因而使得成都县境内无土匪暴乱之事发生。

先生素有把桑梓建设好的意愿。有鉴于要建设好家乡，必须县人上下团结，群策群力，共同努力。因而于1947年组织成都县青年联谊会。后改名为成都县青年励志学会。会址设在成都市青龙街成都县立中学校内。会员有三百余人，均系成都县各乡镇人士。先生被选任会长。刘启明（新新新闻报报社编辑）、吴照华（树德中学校长）任副会长，我任总务干事。学会下设常委会，常委有廖仲和、刘启明、吴照

华、刘仲思（成都县县政府教育科长）、张绍尹（省教育厅督学室主任）、江公笃（省教育厅第四科科长）、叶时俊（成都县国民党党部副主任委员）、雷君放（省秘书处秘书）、苏良弼（川大教师）、傅养恬（川大教师）、胡跃章（成都县社会科科长）、文国沛（成都县政府建设科长）、和周开培等人。由于以黄仲翔（黄埔军校毕业，当时任四川省社会处处长）、叶时俊为首的国民党党政集团搞分裂活动，使得学会在两次大会、三次常委会后，无法搞好团结，遂告夭折。学会自始至终，均未能进行任何活动，先生对此十分沮丧，每谈及此事，辄不胜叹息。

先生在减租退押中表现积极，不但退清自己应退押金，还将住房卖掉，支援亲友退押。例如支援我退押租米老斗（每斗40斤）60石（约合当时人民币200余万元）。又帮助其侄廖品琼退押大米四十余石，并在催押组内做了大量工作，得到退押工作组的表扬和奖励。先生因为提前退清押金，得到减少2％的押金和奖状一张。

1947年蒋介石搞伪宪法，在他统治区内进行立法委员，国大代表的选举活动。当时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，全国进步人士和全国人民均纷纷反对。蒋介石不顾各方反对，一意孤行。当时但懋辛将军的夫人但周梅君参加竞选立法委员，要求先生予以协助。先生乃会同成都县政府教育科长刘仲思，将成都县妇女会选票（未发给选民）约七百余张，装成一袋，交由我送到成都县青龙乡乡长利隆治手，投入票柜内（700多张选票由利隆治乡长完全填成但周梅君姓名）。因

而但周梅君得以当选为立法委员。先生一生虽无较大非议，但此举实属一大憾事。解放后参加民革，在学习会上曾发言检讨此事，深自内疚。

1987年9月6日

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.ertongbook.com